

《回族研究》创刊二十周年纪念精品书系

# 中国名城名镇 伊斯兰教研究

(上)

中国伊斯兰教的绝大多数历史文化名城，包括现存的和仅存遗址的，都同时也是中国的历史文化名城，这使中国意义上的不少历史文化名城名镇更具有厚重的文化魅力。

杨怀中 主编 李兴华 著





### 作者简介

李兴华,河北省内丘县人。1938 年生于陕西周至。1959~1964 年在北京大学哲学系哲学专业学习。1964 年以来,于今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从事中国伊斯兰教、中亚伊斯兰教研究,任研究员。出版有与同事合编《中国伊斯兰教史参考资料选编(1911-1949)》、合著《中国伊斯兰教史》,在王友三主编的《中国宗教史》中撰写了伊斯兰教部分。发表有《回族与中华文明》、《经堂教育与伊斯兰教在中国的学说化》等论文多篇。是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

# 目 录

- 1/ 中国名城名镇伊斯兰教历史文化研究
- 9/ 北京伊斯兰教研究
- 33/ 济宁伊斯兰教研究
- 58/ 开封伊斯兰教研究
- 78/ 朱仙镇伊斯兰教研究
- 91/ 扬州伊斯兰教研究
- 117/ 南京伊斯兰教研究
- 149/ 昆明伊斯兰教研究
- 180/ 纳古镇伊斯兰教研究
- 210/ 河州伊斯兰教研究
- 254/ 兰州伊斯兰教研究
- 288/ 大同伊斯兰教研究
- 323/ 太原伊斯兰教研究
- 356/ 定州伊斯兰教研究
- 390/ 济南伊斯兰教研究
- 435/ 同心伊斯兰教研究

- 468/ 韦州伊斯兰教研究
- 507/ 银川伊斯兰教研究
- 559/ 西宁伊斯兰教研究
- 613/ 循化伊斯兰教研究
- 656/ 西安伊斯兰教研究
- 737/ 泉州伊斯兰教研究
- 817/ 广州伊斯兰教研究
- 879/ 杭州伊斯兰教研究

# 中国名城名镇伊斯兰教历史文化研究

## 一、缘 起

2002年初秋,笔者搜集碑文,又一次来到山东济宁。在东大寺沙彦振、马永才等新老朋友的帮助下,有幸阅览了常志美、李延龄辑著参订的《识认大略》等几篇重要的汉文碑文,从而萌发了研究济宁伊斯兰教的激情。沙彦振等朋友亦有同样的热情,很快就达成了共同进行这一研究的默契。可怎样入手呢?如果仅仅从济宁一个城市的范围入手,视野似乎窄狭了一些。于是就想到了这个范围相对宽泛的题目,想在这个题目的框架内,将济宁伊斯兰教的研究作为其中的一篇。另外也想使研究不仅仅局限于中国伊斯兰教的历史或中国伊斯兰教一教,还想多多少少涉及一些与中国伊斯兰教历史难以割舍,大家又十分关心的理论与现实问题,多多少少涉及一些成为现在文化研究热点的城市历史文化资源保护和城市文化形象的塑造,多多少少对一些研究写作方法作点灵活运用,故写成了这篇名为研究,实只是为研究作铺垫和呐喊的短文,权为正式研究先抛一块砖吧。

## 二、名城名镇研究的学术价值

### (一)名城名镇研究将突显伊斯兰教传入、传播中国的重点

翻阅中国伊斯兰教史,可以看到伊斯兰教无论是传入中国,还是在中国各地传播开来,大都是以名城名镇为重点的。例如广州、西安在唐代,泉州、三亚、杭州、扬州、北京、开封、阿图什、喀什、和田在宋辽,定州、大同、济南、昆明、库车在元代,南京、河州、济宁、西宁、同心在明代,乌鲁木齐、兰州、银川、呼和浩特和天津、上海等城市在清代、民国,都是伊斯兰教在中国传入传播棋局中的重要棋子。对它们专门进行系统研究,必将大大增加中国伊斯兰教史研究的深度与厚度,使传入传播问题的方方面面都能得到一定的向前推进。

## (二)名城名镇研究将突显伊斯兰教在中国发展演变的关节

这就是说,伊斯兰教在中国发展变化过程中的许多起关键作用的环节,也即大的历史事件,大的历史变动,是发生在我们所说的名城名镇之中的。

西安,历史上是大食与唐最早通使之地,有中国清真寺古典建筑的杰出代表——化觉寺,有名义上最早的汉文伊斯兰教碑刻——王 碑,有明洪武圣旨碑现存,为经堂教育陕西学派的中心。

广州,历史上是伊斯兰教自海路最早传入中国之地,有中国现存始建时间最早的清真寺——怀圣寺,有中国传说最早的伊斯兰教先贤墓——宛葛思墓,有中国实际立碑时间最早的汉文伊斯兰教碑刻之一——《重建怀圣寺记》碑,为伊斯兰教汉文碑刻现存数目最多的城市。

北京,为元明清全国伊斯兰教的文化中心,有著名的牛街清真寺与东四清真寺,有记载穆斯林聚居著名街区牛街历史、地理、风土人情、宗教状况的志书——《冈志》存世,清代是内地鲜有维吾尔族穆斯林清真寺的城市,存有清康熙皇帝关于伊斯兰教的圣旨牌,存有 1318 年《古兰经》手抄本,清末民初是中国伊斯兰教新式文化教育和学术研究的发祥地。

南京,明以来是东南沿海地区穆斯林最为集中的城市之一,有东南沿海地区最著名的清真寺之一——净觉寺,原有明御制《至圣百字赞》、明永乐《敕谕》等重要碑刻,为汉文伊斯兰教译著活动的发祥地,有王岱舆、刘智、达浦生等一大批大师级学者和阿洪。

河州,号称“中国的小麦加”,18 世纪后成为回族等族系统伊斯兰教的一个中心,为教派和门宦分布最广的一个地区,其清真寺砖雕工艺和穆斯林民间文学国内外闻名。

喀什,中国新疆地区大规模传入伊斯兰教最早的城市,改宗伊斯兰教的喀喇汗王朝的统治中心,中国伊斯兰文化名著《福乐智慧》的写成地和《突厥语词典》作者的故乡,1255 年建马思忽惕耶伊斯兰教经学院的所在地,有新疆地区最著名的艾提卡尔清真寺。

阿图什,萨曼王朝王子纳斯尔在新疆地区避难之地,曾建有新疆地区最早的清真寺,萨图克·布格拉汗在这里接受了伊斯兰教,死后也葬于此地。

莎车,叶尔羌汗朝时期的政治、宗教、文化中心,和卓势力兴盛时期为黑山派的势力中心。



(三)名城名镇研究将突显伊斯兰教中国化的表现形式之一——中国城市化

虽然我们可以粗线条地说明伊斯兰教中国化主要是通过民族化和地方化两种形式实现的,但认真研究起来,伊斯兰教中国化的实现形式是多种多样的。《中国伊斯兰教史》所表述的是将民族化与地方化较大范围结合的一种实现形式,即认为伊斯兰教的中国民族化和地方化最明显地表现为回族和维吾尔族等民族伊斯兰教两大系统。而笔者撰写的《经堂教育与伊斯兰教在中国的学说化》一文,则是从学术思想的层面来说明伊斯兰教的中国化的。今天设定的这个论题,既有说明城市化也是伊斯兰教中国化的一种表现形式之一的意思。

至于伊斯兰教在中国是如何城市化的,在我们具体研究名城时将会有所回答。这里仅列举笔者研究中国伊斯兰教史时初步体会到的城市化的几个特点,以期引起研究者的兴趣。特点之一是伊斯兰教在中国城市化,从总的趋势看,是沿着先大城市,后中小城市,然后又大城市的顺序。例如唐宋主要限于广州、西安、泉州、北京、开封、杭州这些大的城市,是政治文化中心、交通要道。到元明才开始在许多中小城市中广泛传播。到清末民国,又比较快地在石家庄、蚌埠等大的城市和交通要道城市中传播发展。特点之二是这种城市化大多是局限于城市的一隅。例如北京的牛街、河州的南关。特点之三是城市化多赖于有名望的商人、官员、军人等的支撑。例如蒲寿庚兄弟在泉州,阿老丁在杭州,普哈丁在扬州,赛典赤·赡思丁在昆明,马麒在西宁。

### 三、名城名镇研究的现实意义

(一)名城名镇研究将有利于中国伊斯兰教历史文化资源的保护

中国伊斯兰教历史文化资源有建筑、经书、碑刻、牌匾、译著、文献、谱牒、札付、语言、文字、书法、音乐、歌谣、杂志、刻版、砖雕、良风美俗等多种类型。这些类型,毋庸置疑,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在各级政府、伊斯兰教协会和各地穆斯林的关心与支持下,得到了一定的保护。但也毋庸讳言,一部分相当珍贵的历史文化资源仍遭到损害和冷遇。这种情况在一部分名城名镇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尤为让人心寒。

河北定州城西的定州清真寺,为我国北方的著名清真寺之一,其砖结构无梁殿和殿内米哈拉布艺术装饰,大殿前的元至正八年(1348年)立碑,都是全国伊斯兰教中之最。可有关地方人士却不顾包括阿洪赵志华和笔者在内的众多教内



外人士的强烈反对,紧贴大殿后墙盖起了一座大大损害寺貌、与宗教毫无关系的高层建筑。

江苏镇江剪子巷清真寺,按建筑学家刘致平在《中国伊斯兰教建筑》一书中的说法,其大殿为五座勾连搭硬山屋顶做成,但仅面阔三间,故此形成大殿特别窄长的形状,为国内其他建筑所少见。另外,寺内现还存在的明万历四十八年(1962年)立《古润礼拜寺记》,乃教外著名人士进士李一阳与教内著名人士赐进士马之麒合作撰书的一篇著名碑文。然而就是这座寺,现大殿已成一破烂的大棚,听说已面临改作他用的悲惨命运;就是这篇碑文的刻石,数年前由夏容光老先生辛辛苦苦辨识出来的为数已很少的文字,在风雨的继续剥蚀下,又有一些失去了文字的面容。

明时为山西大同右卫的右玉老城寺,寺的原建筑按马惠真为笔者所画的回忆草图,当是山西境内一座有相当规模的清真古寺,在明代与大同清真大寺一起构成了大同地区清真寺的东西左右两翼。其明正德八年(1513年)刻立《太祖皇帝百字御赞碑》,显示此寺在明嘉靖中(1537~1551年)麻贵父亲麻禄担任大同参将前几十年,即有一定的规模,所以刻立了百字赞碑以示该寺的地位和对明开国之君的尊崇。据笔者调查,此碑乃国内现存刻立时间最早的百字赞碑。然而这座寺早已变成住家,而百字赞碑也早已成为住家屋门前的铺路石,字迹已近完全剥落,很快就会完全失去其历史文化价值。

受破坏和冷遇的情况还有不少,限于篇幅就不一一列举了。造成这种境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笔者也不想怪这怪那,只期望大家都往前看,想方设法改变这种状况。名城名镇研究当是改变这种状况的一个有效办法,因为它以伊斯兰历史文化资源存量较多、品位较高的名城名镇为研究对象,当会突显中国伊斯兰历史文化的独特地位与价值,从而引起更多教内外人士的关注,树立起保护伊斯兰历史文化资源的意识。

## (二)名城名镇研究将有利于中国不少历史文化名城文化多元形象的塑造

中国伊斯兰教的绝大多数历史文化名城,包括现存的和仅存遗址的,都同时也是中国的历史文化名城。这一方面是因为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多宗教、多元文化的国家,一个城市很难说只有一种文化积淀;另一方面是因为伊斯兰教在中国往往是依托中国历史文化名城的优势完成同中国传统文化的较佳融合。可在笔者于北京西单图书大厦见到的千余种内容涉及中国历史文化名城的书籍(主要

是中国旅游类)中,有相当一部分欠缺文化多元这一中国历史文化名城最重要的特点。它们不是忽略了这样一种历史文化,就是忽略了那样一种历史文化。最为突出的就是忽略伊斯兰历史文化。为了说明问题,笔者原来想列举几本,但考虑再三,还是删去了。因为这主要不怪这些图书的编著者,他们又不是中国伊斯兰教历史文化的研究者。可中国伊斯兰教历史文化的研究者,现在又为数不多,他们在“大规模的伊斯兰文化研究活动一时难于展开”(白寿彝语)的情势下,又能提供给社会多少比较系统的伊斯兰历史文化知识呢?所以一些历史文化名城名镇的伊斯兰历史文化的内容得不到应有的彰显,文化多元的特色得不到充分的表现,就不足为怪了。

可这种情况,起码在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名镇保护和开发这一块,不能再继续下去了。因为中国意义上的名城,已经从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强调政治意义,改革开放初期的强调经济意义、开放意义(特区),转变成了现在的既注意经济发展意义、科技教育意义,又注意历史文化意义。在历史文化意义中,也开始从注意一种向注意多种转变。应该说这为开展中国伊斯兰历史文化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大好的契机。我们可以通过对中国伊斯兰教历史文化名城名镇的系统研究,使中国意义上的不少历史文化名城名镇更具有厚重的文化魅力。

### (三)名城名镇研究有利于中国伊斯兰教的逐步稳妥转型

随着中国社会和文化的转型,中国伊斯兰教也要转型,这是毋庸置疑的。不然,它就不可能与时俱进,不可能现代化,不可能进一步与中国社会发展相适应。但由于种种原因,特别是历史遗留下来的一些条件的限制,中国伊斯兰教的转型必须是十分稳妥渐进式地进行,还必须要加大力气来做其他宗教转型不必大做或只需少做的许多准备工作。例如尽力发掘更多历史文化资源,尽力总结更多的经验教训,尽力消解教内部分人对转型的疑虑,尽力减轻社会上部分人对伊斯兰教的误解,提高教内外群众的文物保护意识,促进伊斯兰历史文化名胜的对外开放,进行传统材料的取舍筛选,发挥蕴含在历史文化中的变革动力,等等。所有这些,在名城名镇研究中都会有一定的研究和回答。

(1)名城名镇研究以伊斯兰历史文化资源相对丰厚的地方为切入点,从纵横多个方面进行比较全面系统的发掘,当会发现不少对转型有利用价值的传统文化资料,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中国伊斯兰教历史文化资料欠缺、经过近20余年的努力仍然难以与佛教、道教传统文化相比的被动局面。

(2)名城名镇研究通过一方面总结历史上伊斯兰教同中国社会相适应的经验教训,一方面总结近些年伊斯兰教为两个文明建设服务的试验摸索,当为转型提供较多的历史借鉴和现实示范,以使转型过程尽量稳妥,少走弯路。

(3)名城名镇研究将用历史上伊斯兰教在中国的几次转型的历史事实说明,现在所提的伊斯兰教在中国的转型,只是伊斯兰教在中国具体表现形式的转变,只是伊斯兰教中国化总进程中的一种阶段性变化。它既不会改变伊斯兰教的基本信仰,也不会舍弃伊斯兰历史文化的资源部分;它既不会西化、汉化,也不会发生所谓的“世俗化”。这样,就会有利于消解教内一部分人对转型的疑虑。

(4)名城名镇研究将会使中国伊斯兰教集中从历史文化的层面与城市的角度,有重点的、有内容的突显出来。伴随着中国社会文明程度和人们文化素质的提高,一定会大大减少社会上部分人认为中国伊斯兰教缺乏文化品位的误解。

(5)名城名镇研究将使名城名镇的著名清真寺和先贤墓地等宗教活动场所,在传统功能之外,同时具有名胜古迹和旅游欣赏等开发利用功能。这样就会大大提高教内外群众对这些名胜的文物保护意识。

(6)名城名镇研究将会促进名城名镇中著名伊斯兰教名胜的有条件逐步对外开放。这将有助于逐步改变“历史虽久人不知,文物虽优外无名”和外人“慕名而来,被拒而去”这种在过去社会氛围下形成的状态。

(7)名城名镇研究将在历史文化的分类分析中,自然而然地进行转型。区别哪些内容应该保护继承发扬,哪些内容需要修正、补充、充实,又有哪些内容必须舍弃,这就等于为如何实施转型作了一定的材料准备,在一定意义上也可说为转型提供了部分答案。

(8)名城名镇研究将会使蕴含在中国伊斯兰历史文化中的优良传统大大发挥出来。这对中国伊斯兰教的顺利转型是至关重要的。设想一下,若是没有像爱国爱教、劝人行善、宽以待人、追求知识、鼓励清廉这样一些优良传统,时代再要求,外力再推动,社会再希望,也是没有内在的动力去推进这种文化的转型的。

#### 四、名城名镇研究的方法取向

名城名镇研究并不准备采用什么新的研究方法,只不过设想中的研究一城又不完全限于一城,讲史又不完全是讲史,谈文化又不单纯是谈文化的体裁,这使笔者不得不把设想中的研究方法或写作方法作一个交代,以免给读者阅读具



体的名城名镇研究成果时,造成不必要的麻烦。

名城名镇研究的方法取向,具体说来有以下几点。

以“点”为主,适当兼顾“线”与“面”。这就是说,名城名镇研究虽然从目前设想来看,是选择一个一个的“点”(名城名镇)进行研究。但也不能脱离“线”和“面”的一定说明。例如研究西安,就不能完全离开对丝绸之路一线的叙述,就不能完全不谈它在伊斯兰教传入中国总格局(面)中的地位与作用。

以历史叙述为主,适当兼顾一些理论与现实问题的探讨。历史并不单纯是历史本身,还应同时涉及历史的意义和价值、命运和未来。这不仅可以增加历史叙述的深度和厚度,而且还可以增加历史叙述的魅力。名城名镇研究亦准备采取此种取向。设想在叙述名城名镇历史文化全貌之外,也兼顾伊斯兰教在中国城市化、传统与现代的关系、中国伊斯兰教的转型等理论问题和一些现状问题的研究。

主要研究文化层面,但亦涉及广义伊斯兰教的其他有关内容。这就是说,名城名镇研究的一个重要动机就是想搭中国历史文化名城的车,来研究中国伊斯兰教的一些有代表性的城市。所以这里的伊斯兰教和这里的历史文化,都取它们的广义。

集中研究伊斯兰教,但亦适当涉及一些其他宗教或其他历史文化形式。显然,这与前一部分所说的名城名镇研究的第二项现实意义有关。

编写主要采取史的体裁,但亦兼顾志(地方志)、集(资料汇集)的一些特点。这就是说,此研究的最终成果,主要想写成史的形式,但亦可以作为某某城的伊斯兰教志或某某城的伊斯兰教资料汇集来用。

## 五、说 明

有几点需要作些说明。

第一,作为本研究对象的历史文化名城,仅限于中国伊斯兰教这一特定范围,绝没有把它作为某一城市历史文化统一定位的意思。

第二,作为本研究对象的历史文化名城,是就全国范围的伊斯兰教而言的。至于各省(自治区)、各地级市等范围内名城(如安徽寿县、河南禹州),当不在我们研究之列。至于何谓我们所要研究的名城,我们采用的标准是:至少要有一项历史文化事件具有全国性影响或具有中国伊斯兰教全局性的意义。但这在学术

界显然不会看法完全一致,特别是在名城名镇研究的初期。

第三,研究涉及的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只限于现存的。至于已成历史遗迹的中国伊斯兰教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如阿力麻里、黑城,当不在本研究之列。

第四,名城名镇研究只是中国伊斯兰教历史方化重点研究的一部分。从确切的意义上说,只是历史地理这一特定领域重点研究的一部分。所以,对它绝不能过分宣扬,对其他绝不能有所轻视。实际上,无论是对阿力麻里、黑城这些遗迹名城的研究,对一些省市范围内的名城的研究,还是对名镇(如河南开封朱仙镇、甘肃临夏三甲集镇)、名村(如云南通海纳家营、宁夏永宁纳家户、云南个旧沙甸、河南沁阳水南关)、名街(如北京牛街、山西长治回回一条街)等的研究,都会展现出各自不同的特色,从而给我们带来一种新的历史文化享受。

(原载《回族研究》2003年第4期)

# 北京伊斯兰教研究

况西则天房,中天而立;东则京师,冠世为都。此寺颓则难为教,此教衰则难为冠。

——牛街清真寺碑语

在中国有伊斯兰教的名城名镇中,论重要性,还没有哪一个能超过北京。所以对中国名城名镇伊斯兰教的研究,首选北京,就是很自然的了。

## 一、北京伊斯兰教的地位

### (一) 元代以来全国伊斯兰教的中心

鉴于北京自元以来,绝大部分时间内,都是全中国的国都,也鉴于伊斯兰教自元以来就开始遍及包括北京在内的中国,所以北京伊斯兰教在全国伊斯兰教中为冠的地位,从元代起就奠定下来了。

在元代,北京是多种来源的穆斯林的云集、落籍或中转之地。在蒙古主改国号为大元(国号加“大”字始于元)前8年,也即宋景定四年、蒙古中统四年(1263年)的户口统计中,中都(即后来的元大都)就“已有回回人约三千户,多为富商大贾、势要兼并之家”<sup>①</sup>。在元代,有众多的穆斯林名人,如牙老瓦赤、赛典赤·赡思丁、阿合马、倒刺沙、扎马刺丁、也黑迭儿丁、高克恭、赡思等,主要或曾经在北京活动。在元代,中央政府曾在北京设立管理全国穆斯林事务并有司属的专门机构“回回掌教哈的所”。在元代,据《伊本·白图泰游记》的报道,元朝皇帝还在北京任命了一个“全国穆斯林的首领,并以刷德尔·知汗称呼他”<sup>②</sup>。在元代,北京还是回回司天台、回回司天监、回回药物院(上都亦设)等与穆斯林有关的机构所在地,并藏有与穆斯林文化有关的不少书籍。

到明代,从明永乐十九年(1421年)正式迁都北京起,北京的伊斯兰教又逐

渐恢复了全国伊斯兰教中心的地位,之中包括许多穆斯林随燕王扫北而来,成为北京穆斯林的一个主要来源,包括法明、普寿、礼拜、清真四大官寺的敕名,包括其他城市难以相比的穆斯林文职、武职、内廷、世袭掌教四大阶层的形成。另外,明代北京也是藏有伊斯兰教典籍较多的城市。胡登洲在燕市从一教中老妪筐中得见伊斯兰教经典一册,刘智在京师得吴氏藏经数十册,皆是证明。

进入清代,北京伊斯兰教的中心地位较明代有明显提升。表现之一是一定数量的维吾尔族穆斯林开始走上北京伊斯兰教的舞台,清廷又在他们定居的西长安街回回营敕建了礼拜寺,并题写了碑记。表现之二是清廷有意识地将北京伊斯兰教作为向全国伊斯兰教警示的窗口,或用北京伊斯兰教中发生的事件晓谕全国,或就地方发生的事件在北京作出反应,正所谓“敲京钟以警天下”。表现之三是北京伊斯兰教在清的大部分时间内,名副其实地在学术文化的角度也成为全国伊斯兰教的中心。这从王岱舆、马注、刘智、金天柱、舍蕴善、王宽、杨仲明等著名伊斯兰教学者在京的学术活动可以看出。

到了民国年间,北京虽并不都是全国的政治中心,但北京的穆斯林,包括在北京活动过的穆斯林,却忍辱负重,历经艰难,在振兴教育、振兴文化、爱国爱教、与时俱进等方面作出了突出贡献,走在了全国各城市的前列,仍不失为全国伊斯兰教的中心。

新中国成立后,北京是中国各民族穆斯林的全国性宗教团体——中国伊斯兰教协会的所在地。中国伊斯兰教协会主办有全国性伊斯兰教高等专科学校——中国伊斯兰教经学院和面向全世界公开发行的综合性刊物《中国穆斯林》杂志。这三大基本点连同北京 700 余年以来一贯下来的全国伊斯兰教中心的传统,使北京伊斯兰教仍继续处于全国伊斯兰教中心的位置。

## (二)世界各国各地区观察了解中国伊斯兰教的窗口

自元代起,外部世界就开始把北京伊斯兰教看做观察和了解中国伊斯兰教的窗口。13 世纪末成稿的《马可·波罗游记》,1356 年书写完毕的《伊本·白图泰游记》,中亚穆斯林学者阿里·阿克巴尔于 1516 年著的《中国纪行》,1910 年首次在伦敦出版的英人布鲁姆霍尔的《清真教》,1911 年正式出版的法多隆考察团的《中国穆斯林调查记》等,都有关于北京伊斯兰教的内容,尤其是《中国纪行》,可说是真正以北京为观察中国伊斯兰教的重心。不过北京伊斯兰教真正向全世界敞开口却是 1978 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



有两点需要说明:一是世界各国对北京伊斯兰教的观察,大多并不限于宗教本身,而是多有以此透视中国政府民族宗教政策,以及中国社会安全稳定形势的意味。二是世界各国对北京伊斯兰教的观察,无论是历史上的还是现在的,我们都应抱欢迎重视但应采用分析的态度。

### (三)北京的四大宗教之一

北京是世界四大宗教——佛教、基督教、天主教、伊斯兰教和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道教一应俱全,且都有广泛重大影响的城市。今天这五大宗教的全国性宗教团体都设在北京。

伊斯兰教则以持续历史较长(如基督教是时断时续)、分布较广(各城区郊区都有)、民族性特别明显著称。

## 二、伊斯兰教的传入北京

像伊斯兰教何时传入中国是一个难点问题一样,伊斯兰教何时传入北京也是一个很难确切回答的问题。目前最具代表性的说法有二:一是北宋至道二年、辽统和十四年(996年)说,一是所谓的元初说。前者为介绍北京伊斯兰教历史,特别是牛街礼拜寺始建历史的大多数出版物,如《中国伊斯兰百科全书》《伊斯兰教辞典》等所主张,主要是根据俗称“白匾”的《古教西来历代建寺源流碑文总序略》。后者为姜立勋等著《北京的宗教》一书所提出,主要是通过将对前说的一系列订误和认为历史上将蒙古军1215年攻克金中都到1271年蒙古主改国号为大元这半个世纪“亦视为元,归入元初”,故持“今北京地区之有伊斯兰教”“实始于元初”之说<sup>③</sup>。

依笔者看,北宋至道二年说确系对“白匾”的误读,因“白匾”并未明言筛海革哇默定“入觐中国”是入觐北宋之东京(今开封),还是入觐上京、中京、西京或南京(今北京)。从“北宋至道二年”年号看,倒更像是入觐宋之东京,而不像是辽之南京。另从“白匾”所述革哇默定及其三子的经历来看,是经历了革哇默定入觐中国→感异梦生下3个儿子→其中两个儿子被授为清真寺掌教从而留居东土→这两个儿子知燕京为兴隆之地遂请颁敕建寺→于是分别建寺于燕京之东郭与南郊这样一个过程的。这样,即使按“白匾”,北京建寺或有伊斯兰教的时间,也起码要在公元996年之后的二三十年,即11世纪二三十年代。

况且,“白匾”本身又有一个先有旧有碑文,后经明崇祯三年(1630年)重修,

最后又在清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增补重修的过程。之中,是否有改动,也是颇有疑问的。北京马甸寺清道光三十年(1850年)《重修京都德胜门外马店礼拜寺碑记》就有“至宋真宗(998-1022年)时,有筛海那速鲁丁·撒阿都的,始奉诏建礼拜寺于燕京”这样不完全同于“白匾”的说法,何况以前呢?

更重要的是,“白匾”所述,基本上是一种传说。和宛葛思传说一样,在暂没有确切材料的情况下,这种传说只能“权作”伊斯兰教传入某地的时间,而不能认作伊斯兰教传入某地的确切时间。

可《北京的宗教》一书所持的说法,也难以使人满意。首先将蒙古军攻克金中都到蒙古主改国号为“大元”这半个多世纪称作“元初”,不像是中国历史分期的公认方法。其次也不大符合伊斯兰教在辽时已在归化州(今河北宣化)、上京(今内蒙古巴林左旗境内),西南路招讨司(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市东)、咸平府(今辽宁开原)等今北京附近有所传播<sup>④</sup>,而今北京辽金时乃松漠以至蒙古草原与中原内地进行商业交换的枢纽这两个最基本的现实。

鉴于第一种说法基于可能有所改动的传说,第二种说法又有些不大符合伊斯兰教在我国北方传播的实际而有些时间偏晚,故我们想采用一种时间跨度较大、给进一步研究留有较大空间、适当包容两说的新说法,即将伊斯兰教传入北京的时间先圈在11世纪初到13世纪初这200年内。这样,这个跨度较大时期的上限则采用“白匾”,下限则采用《北京的宗教》一书,中间部分则利于进一步研究,并寄一点希望给今后的考古发掘。

### 三、北京的清真寺

北京伊斯兰教为全国伊斯兰教之冠地位的表现之一就是清真寺。可北京的清真寺既不是以数量之多或历史最古为冠,也不是以规模最大或建筑面积最广为冠。那么是冠在哪些方面呢?

一冠在明时有4座“官寺”并都有明代皇上题名。

所谓官寺,即拥有礼部所发札副、冠带,从而掌教者冠带荣身、住持是寺,以领众焚修、祝延圣寿,享有一切差徭概在蠲免之列特权的清真寺。其中一部分系奉敕修建、重修或由皇上题名。根据现有材料,明代应天府(南京)、西安府(长安、咸宁)、京师、定州、易州、凤阳府皆有清真寺为官寺。另据河南沁阳水南关寺明掌教札副题刻,大兴县亦有官寺。有的官寺,如净觉、礼拜2寺,还系奉敕修建并由